



自由谈

# 接地气的改革才能不背离民意

邓聿文

中央深改组召开了最新一次会议，一口气推出了七项改革举措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深改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上还就改革要接地气的问题发表了讲话，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改革定力、保持改革韧劲，加强思想引导，注重研究改革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锲而不舍、坚韧不拔，提高改革精确度和精准落地能力，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。要在国企、财税、金融、司法、民生、党建等领域，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、措施实、接地气的改革方案，要在是否解决了突出问题上下功夫，让实践来检验、让基层来评判、让群众来打分，确保改革落地见效。

改革要接地气，这个提醒确有必要。首先，改革不接地气，会造成改革的方案或措施出现偏差。所谓接地气，无非强调改革要切合实际，满足老百姓的需求，解决

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公平和发展的问題。不接地气，就只能凭空想象，或者从二手材料中来制定改革方案。虽然现在推出重大的改革措施前，一般都会有个调研论证过程，但若不接地气，这个过程极可能沦为表面功夫，作秀，或者抓不住重点、难点、百姓关心的焦点，从而推出的改革方案和举措失之偏颇，不是百姓需要的。

其次，改革不接地气，会造成改革得不到百姓支持，无法落地。改革是要解决问题的，而与百姓利益相关的问题最容易得到他们的关注，从而，基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改革也最容易得到百姓的拥护与支持。改革不接地气，看似也要解决问题，但要么这些问题百姓关注度不高，要么现阶段不是很迫切，要么虽很迫切，但现阶段缺乏解决条件，强行推行反而会坏事。因此，不论出现哪种情况，不接地气的改革都很难得到百姓的真心支持，而没有民意支持的改革，是很难走远的，多半落实不了，成为一个半拉

子工程。

第三，改革不接地气，甚至会出台损害百姓利益的改革方案，从而遭到他们的反对。背离百姓的需求，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改革，通常都是不接地气的改革。

我们还可以列出改革不接地气的许多后果。但要指出的是，强调改革要接地气，不是简单地讨好和迎合百姓。一些既与百姓利益切实相关，又于社会长远发展有利的改革，可能短期内不易得到百姓理解，不讨他们的欢心，但从社会的整体效应看，又必须推出，对于这类改革，就需要讲道理，反复地讲，同时做到在改革推进中，将百姓的阵痛减到最低，相信民众并非不讲理。

改革为什么会不出现不接地气的情况？究其根源，同利益和观念有关。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，而且越到后来，帕累托累进的、多数人都得益的改革越少，利益博弈的色彩越浓，这样的改革推到谁身上都不乐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制定改革方案

的人，主导改革者，如果不沉下心来去进行艰苦的调研，或者调研走马观花，乃至屁股坐歪了，不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出发，而只为了少数资本和权贵集团的利益，如此改革是不可能接地气的。

另一种情况是改革主导者的观念出了问题。他们也想为百姓谋福利，至少他们在制定改革方案时，不是从私心出发的，但他们头脑中没有群众观念，精英意识太强，在关系到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改革方略的制定上，不能唯民是从，跟在群众的后头，去迎合民意。在他们看来，百姓多半是自私和目光短浅的，只着眼于眼前利益，如果听取百姓意见，以百姓意见来制定改革方案，改革就会沦为民粹主义。这种精英意识妨碍他们从群众中听取合理的意见，改革也就不可能接地气。

无论利益还是观念作怪，一个共同的背景是权力主导社会，这使得有权制定改

革方案或措施的人，天然地容易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。其实，不仅是改革方案的出台，大凡政策、法律制定等一切公共事务，都存在一个如何接地气问题。尤其对某些地方和基层政府来说，这一问题还很严重，原因在于，上面受到的约束和监督更多，基层就是土皇帝当家，实际无人监督和约束，这使得基层行政权力更为所欲为。

要解决改革接地气的问题，说易行难。难就在于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一时难以改变。但这不是说，对此事就一筹莫展，还是可以并试着在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中，建立更严格的问责程序，并且向社会公开，加强改革的透明度。现在从上到下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程序规定，问题是公开不够，透明度不足。只有充分公开、保持透明，让大众了解改革的真实情况，才能引入外部监督，从而迫使官员不得不去接地气，从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问题入手，制定改革方案，推进改革。

## “碰瓷”的城管和“摆拍”的温暖

李晓亮

术业有专攻，哪怕是“碰瓷”，最好也还是让“专业人士”来。就像《欢乐喜剧人》的口号：搞笑，我们是认真的。而其中一期，宋小宝团队就曾演过一出碰瓷喜剧。

宋小宝饰演的专业碰瓷人士，每天“出工”，自带系列职业道具：就像他从业老师小品中的名句所说的——你多大鞋，我多大脚——他照此自备了碰瓷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全套天灵盖到脚后跟的线性、粉碎性骨折CT图；还有自导自演、“保留现场，拍照留证”的全能自拍杆——保证你能撞到的地方，他都事先准备好“证据”，而且按器官部位，明码标签，童叟无欺。

这堪称碰瓷业的“职业素养”。联想起这个专门讽刺碰瓷的喜剧作品，是因为看到一条非常业余的“作品”，毫无专业度和敬业度可言，即“河北城管无故倒地‘碰瓷’执法，官方称系临时工”（澎湃新闻8月19日）。近日，这段“碰瓷式城管执法”视频热播微博：与摊贩没有任何肢体接触，执法的河北衡水饶阳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城管人员突然倒地，向同伴求救并大呼“报警”。据称，涉事城管系临时工，目前已被辞退。

这种“料理后事”的套路再熟悉不过，只要有这种因个体行为给组织招致“负面”评价的涉事人，十有八九是要遭辞退的临时工。这样的处理算不上兴奋点，倒是城管执法时演技夸张，堪称创意满满的碰瓷让人印象深刻。和宋小宝的专业碰瓷表演比，这名“临时工”更像前段儿的热映电影《路人甲》里的群众演员，生涩业余，还不时偏头偷窥镜头。

城管因职业特殊性，连其模糊的行政序列属性和执法权都一直在争议。何况具体到上述事件，摊贩、城管的责任大概也属于该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这种被逼无奈的碰瓷“被动表演”，如果还不算特别出格，那主动在镜头前进行欺瞒性的摆拍表演，是否更令人无法接受呢——“曝山东一环卫局给环卫工人发避孕套，拍照后收回”。（新华网8月19日）

冬日送温暖，夏日送清凉。城市环卫工，值得每个人尊敬。而山东省昌邑市环卫局这次的摆拍表演，真让人心寒齿冷——“总共4袋绿豆、20斤茶叶、200条毛巾，昌邑市总共共有300多位环卫工人”，重点则是摆拍后慰问品悉数收回，并未真正发放。较之于技穷后的城管“碰瓷”还是个人行为，那环卫工摆拍送清凉，就完全是个别官员政绩意识下的虚假宣传，是恶意思弄的表演，更应被问责。

从刻意摆拍或可推测，此地环卫工酷暑连基本高温补贴和消暑福利可能都不到位，从保障这种高强度作业工种的角度来说，昌邑市环卫局是否违规？摆拍作秀是明知失取还要以虚假宣传照来美化“政绩”，这种主观作恶理应罪加一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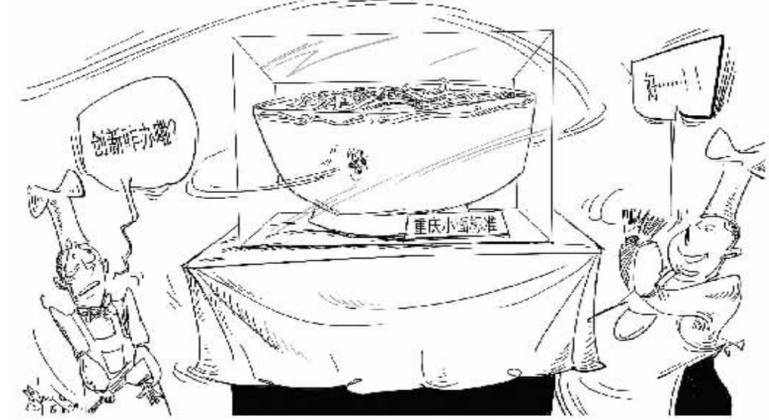
看了一线“临时工”城管的碰瓷表演，再看个别环卫官员享受虚假摆拍的表演秀，赤裸裸的表演在从执法到宣传的不同层面蔓延，这个趋势是否应该引起我们警醒？所有表演不管是碰瓷还是摆拍，都离真相很远，权力造假不能暖心只能让人恶心寒心。在公共领域，在公共生活中，又有多少类似的无奈被动或积极主动的“表演”发生？谁来撕开作秀表演的假面，来惩处权力的失范，来保障民众权利？

汤勇

我们教育方针一贯主张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全面发展，然而当下不管是学校教育，还是家庭教育，在教育五个环节中，劳动教育大有越来越淡化之势。

究其原因，对于学校层面，唯分数至上的教育观，让学校为分数而战，老师为分数而教，学生为分数而学，凡是考试要考的，老师就教，学生就学，凡是对分数有可能带来影响的教育教学举动便成了多余的，劳动教育在学校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。

对于家庭教育，如今的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即使他们在家有时间劳动，父母对他们也很习惯，不会让他们动手劳动，生怕累了、苦了孩子，还有的父母会让孩子把所有时间用在学习上，哪怕节假日都必须奔走于各种补习班、特长班、兴趣班，生怕误了孩子的学习。因此，使现在的孩子劳动



## 标准化

8月18日，重庆小面标准化高峰论坛举行，来自市内多个知名小面品牌的老板与会，研讨到底应该是佐料的标准化，还是产品的标准化。（《重庆晨报》8月19日）

漫画：徐简

## 政府数据共享理应价值最大化

冯海宁

李克强总理8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会议通过了《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》（下称《纲要》），强调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互通共享，消除信息孤岛，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资源，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“打架”，增强政府公信力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（《新京报》8月20日）

虽说大数据时代2012年就已开启，“大数据”也成了近几年最火的词语之一，然而，作为我国大数据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信息和公共数据，仍处于“割裂”状态。这次，总理就指出，“目前，政府各部门已经建成了十几个数据平台，但问题是，这些平台相互不连通，只是一个一个的‘信息孤岛’。”

政府数据（即公共数据）除“割裂”之外，部分还处于“沉睡”状态。比如，有的老数据至今“躺”在档案袋、文件夹中，这对数据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是一种浪费。这次会议通过的《纲要》，更像是“大数据发展指南针”。总理也向有关部门明确要求：政府大数据建设，首先要实现

所有部门的数据“共享”。

推进政府公共数据互联互通具有多重利好，比如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效率，因为数据共享便于决策；再如，能够避免数据重复建设，可以节约公款；避免数据“打架”，可以防止信息混乱。尤其是，它能让这一公共资源最大化利用，服务于公共、商业等领域，譬如，助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

政府大数据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，唯有最大化利用才能产生最大价值。而要最大化利用它，推进数据共享只是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此外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譬如，要有权威机构、专门人才对大数据进行实时更新、分析、解读。

只有让政府大数据真正成为决策依据，才能产生应有价值。之前，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国企决策，之所以出现决策失误等问题，原因之一就是决策者不重视、不参考相关大数据。如果引导甚至强制要求各级政府在大事决策环节以大数据为参考，应该有助于避免决策失误。很多国家的政府早就对各种公共数据进行了收集、分析、利用，如2009年英国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公共网站，来自七个政府部门的

1000多个既有数据集对外开放，后来增加到8633个数据集。2011年，韩国总统国家ICT战略委员会发布了“大数据倡议”，旨在建立泛政府大数据网络和分析系统。

因此，《纲要》推进我国公共数据互联互通共享，让“小数据”变“大数据”，是十分必要的。不过，就数据共享来说，可做的“文章”还很多，如把那些“沉睡”的老数据、旧信息纳入政府大数据库，对某些可疑数据进行重新审核和分析。

不仅国家各个部门各自掌握的数据要在国家平台上实现共享，地方各个部门“垄断”的数据也要在地方专门平台上实现共享；除了横向数据共享外，还要实现纵向数据共享，即全国教育、卫生、住房、工业等系统的数据库，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，也要在系统内实现互联互通。

要实现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互通共享，《纲要》推动外，还应纳入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相关法规约束。甚至有必要针对政府大数据建立专门制度，让政府大数据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。从此前全国住房信息联网进展迟缓来看，实现公共数据互联互通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专门制度来“护航”。

## 城市的宜居应是所有人的宜居

张松超

8月18日，《经济学人》智库发布最新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，在过去一年内，北京的排名上升了5位，位列第69，蝉联中国大陆最宜居城市；全球最宜居城市则被澳大利亚墨尔本摘得。（《北京晚报》8月19日）

看到这一版本的宜居城市排名，不少人可能都笑了，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讲，单是北京房价这一项就足以令人生畏，甚至不少“北漂”为此被迫逃离，更别说北京的其他大城市病了。在这样的直接感知下，连“易居”都做不到，又何谈“宜居”呢？

北京成为中国大陆最宜居的城市也并非不可能，甚至也很容易实现，简单到调查者只需变换几个指标。《经济学人》智库版本的评价依据，是“稳定性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和环境、教育、基础设施”五个指标，如此一来，诸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能够上榜，完全在情理之中，因为这些指标与大城市的条件完全是对应的。

但如果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评价城市“宜居”，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？

以同样是2015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的新加坡版本为例，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无一进入前十，因为单是“生活舒适”指数这一项，就把那些城市病极其严重的一线城市排除在外了。回到《经济学人》智库版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，不难发现，它之所以与国人的实际感知有出入，乃是因为其固有的衡量指标不足以测量出“宜居”二字，缺少“宜居”本应具有的内涵。

何谓宜居？“二战”后，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最早提出“人居环境科学”的概念，在他看来，城市要想宜居，首先必须得是一个人的城市，是一片能让人生活的乐土。这里所谓的“人的城市”，当然不能以经济状况和阶级地位进行区隔，它不只是富人的宜居，而更应该是中产阶层以及绝大多数弱势群体宜居的宜居，这也是我们评价一个城市宜居与否首先应该具备的价值取向。否则，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再好，公共资源再丰

富，居于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却享受不到，这样的宜居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“花瓶”。

因此，衡量城市宜居与否，要想与普罗大众的实际感受相吻合，必须具备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，即占据城市人口多数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，他们的权利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能被边缘化。这不是真正的宜居，其所包含的公平和正义等价值取向，也是这个社会本应具有共识。在此逻辑之下，不能只是让有能力者享受到“宜居”的城市环境，否则就是一种假象且不可能持久。

所以，全球宜居城市排名要想避免被质疑，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宜居应是所有人的宜居，她不是部分人的宜居。而大众的吐槽或情绪化表达，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，即不把宜居的核心要素——人，纳入测量指标中，不仅会增加社会的负面情绪，也会造成一种社会阶层的内部对立，让这个社会更加走向撕裂。

## 劳动教育是最好的生活教育

质在于孩子在参与劳动中最终树立劳动观念，增强劳动意识，提升劳动能力，激发劳动热情，并充分认识到劳动的真正价值。

当然，也不能把劳动教育仅仅理解为就是让孩子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打扫卫生。这些虽属于应有之义，然而不是全部，除此之外，劳动教育，还可以用更多的词去描述它，比如让孩子参与生产劳动、参加社会实践、进行实训操作等等。

当下孩子接受劳动教育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课堂上特别是语文课堂上完成的，孩子们在摇头晃脑吟诵的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算是所接受的一种最现实的课堂版劳动教育。然而，要真正体现劳动的意义，仅停留在课堂

是不行的，还必须让孩子走出课堂到课堂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参与历练。

在我们四川阆中，这些年来，很多农村学校或利用学校农园地，或租赁农户土地，或与农业示范基地合作，有了自己的种植养殖基地。这些基地既是孩子们学习劳动技能的课堂，也是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的体现场。更让他们亲近农村农业的“开心农场”。在这里，孩子们陪伴着自己栽培的作物、喂养的动物，一天天长，既享受着自己亲手劳动收获的成果，又由此留下了乡村学校的味道，增进了与乡村的情感，并帮助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，这些都是常规的课堂不可替代的。

劳动教育要真正回归，仅凭一个文

司华能辛店电厂烟囱玻璃内筒安装工程“6·25”事故调查报告》。杨秀英拿着这份报告，找到了淄博市政法委“见义勇为办公室”一位主任，该主任说李克平的条件都符合“见义勇为”，但期限已经过了，没法申报。至此，奔波8年、辗转多地的杨秀英还是没能为丈夫讨回一个“见义勇为”称号。

《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》第二章第十条规定：“申请、举荐确认见义勇为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；情况复杂的，不超过两年。”照此规定，杨秀英的确超过了两年的申请期限，规定确有其稳定性和严肃性，但宣传、奖励见义勇为人员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，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诸多困难，从而更好地弘扬社会正气。尤其是考虑到李克平当年在救助工友过程中存在见义勇为情节，相关部门若是真正贯彻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若是真正有心，理当主动配合英雄家属完成确认程序，而非坐等英雄家属上门，更不应该在办理过程中一再回避、推诿、拖拉。如果李克平生前打工过的电厂及当地相关部门能主动、积极地帮助杨秀英完成申报手续，又怎么会有今天的“申报期限已过”？

## 小费是习俗而非制度 何须政府推动

朱达志

“一直属于灰色收入的导游小费有可能合法化。”据悉，国家旅游局等三部委已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》，其中明确提出“旅行社要探索建立基于游客自愿支付的对导游优质服务的奖励机制”。

但媒体调查发现，不少人担心原本基于自愿的小费支付会变成变相的强制性支付，反而增加旅游成本。这担心有其合理性。实际上，“基于自愿的小费支付”在当下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，若一定要在官方文件中加以“明确”，最终“变成变相的强制性支付”几乎就毫无悬念，甚至“变相”二字都显多余。

当下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“小费文化”，严格意义上的小费源于英国，相传在18世纪的伦敦餐馆里，餐桌上常放着一只碗，上书“To Insure Promptness（保证迅速服务）”，客人只要将小额钞票或硬币投入碗里，便能享受侍应生提供的优质、快速服务。有人认为是小费“制度”的起源，其实后来小费习惯从餐饮业扩展到几乎所有服务业，靠的不是“给了小费就保证提供优质迅速服务”这样的承诺，而是一种文化自觉。

小费不是制度，而是习俗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社会自发习惯。实际上，西方也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反小费的浪潮，反对者认为给小费是一种不良风气，号召人们加以抵制，以至于一些国家的官方还曾从制度层面予以限制，只是收效甚微。小费打不倒的根本原因，还在于西方消费者对服务上乘者，是心甘情愿愿解囊打赏的，给小费体现了他们

的一种风度，庶几可谓一种精神需求的满足。

其实，中国古代也有给“赏钱”的习惯，赏赐对象有店小二、奴仆、书童、小厮、跟脚等，小费并非西方专利。而且，中国古代的小费习惯养成与西方人的小费习惯养成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即贵族文化催生了小费习俗。英国自不待言，中国古代也是有贵族的，至少在唐宋时代，贵族精神在我们的世家望族和门阀阶级中，多少还是存在的；即便一般民众，基本的礼义廉耻智信，还是具备的。只是到了后来，我们对精神层面需求的重视程度弱化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“打赏”习俗还保持着。

后来，贵族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消失，大家表面上已经没有了高低贵贱，谁有义务和资格去赏赐谁呢？缺少这样的精神需求，也就少了这样的习惯养成，所以现在来谈论小费，都容易把它当成舶来品。

回头再看“导游费制度”，就有些一厢情愿。没有小费习俗，于是想用制度去强制推广并规范小费行为，只能将习俗变成强制，让原本美妙的消费体验变成消费噩梦。发生了那么多的游客与导游冲突，还不足以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吗？那些强制消费事件，说白了，就是将“旅游纪念品商店”作为索取“小费”的中介。可试图把强制消费的潜规则变成明规则，注定了是徒劳的。

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想办法让我们的旅游市场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，让它去自发调节供需关系，自发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。到时候，合理的小费规则自然会形成，无须政府去“推动”。

## “见义勇为”八年申请 寒了谁的心？

谢庆富

李克平是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人，2007年在山东淄博市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华能辛店电厂项目打工，从事烟囱玻璃内筒安装工程。当年6月25日，李克平和工友施工时，工地突然发生火灾，他用铁链将另外两位工友固定在烟囱顶部的避雷针上以逃过一劫，自己却坠地遇难。事发几个月后，李妻杨秀英得知丈夫在事故中有救人行为，于是四处奔波为其申请“见义勇为”称号，但奔波八年后一直未果。（《大河报》8月20日）

据报道，当年事故发生后，杨秀英赶赴淄博，在万分悲痛中处理完丈夫后事，但当时并没有人向其提起李克平见义勇为，她直到半年后才“隐隐约约”听到有人议论，说其丈夫在事故中有救人行为。想“弄清楚此事”的杨秀英再赴山东，找到被救的两位工友，拿到他们确认丈夫救人的带有手印的证言。不过，辛店电厂、淄博市安监局等部门都说事情已经过了，杨秀英为给丈夫“讨名誉”，屡屡碰壁后又去找山东省里的部门，后来又去了国家安监总局。去年5月，在国家安监总局信访部门的介入下，她才从淄博当地拿到了一份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

件是不行的，作为教育人还必须以应有的使命和担当，坚守教育良知，切实转变教育观念，花大力气冲破当前应试教育的束缚，把劳动教育列入议事日程。如果应试教育还肆无忌惮，如果分数和成绩仍是教育的全部，劳动教育被弱化、淡化乃至被边缘化便是一种必然。

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提出“生活教育”理念，认为教育即生活，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对此也有论述，他认为“生活即教育”，国家督学、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所主张的“三生教育”，其中便包括生活教育、生存教育、生命教育。

其实，劳动教育就是一种生活教育，而且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教育，孩子在劳动中获得一些生活体验，以及从劳动中获得生活的乐趣，培养一种现代新生活的态度与方式，既是今后生活的需要，也是未来生存的需要，更是让其生命更好地发展的需要。